

火红的年华

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编



火红的年华

梁步庭题

中国青年出版社

火 红 的 年 华

※

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征委会印刷所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5印张 189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06—0679—6

K · 8 9 （非卖品）

编辑说明

本书是以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为主的山东青年运动回忆录。全书43篇文章，按照回忆内容发生时间的先后，依次排列。它反映那个时期山东青年的思想情操，青年组织的工作、活动及重要会议，介绍著名青年烈士的事迹。本书所写是作者们的亲历、亲见、亲闻，并且经过认真的考订核查。因此，它可以看作是一部形象化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青年运动史。它不但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的研究，具有史料的价值，而且对于当代青年继承先烈的光荣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是一本有益的思想教育读物。

编者

序

李锐

人们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在1949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到哈尔滨，南到云贵川，东到苏浙闽，西到疆藏边陲，到处都有大批年轻的山东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总数约在10万以上。有的省（市），如苏浙闽沪，从省到地区、县，甚至基层领导班子，也都有年轻的山东干部在从事开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工作。在山东省的历史上，有这样多的人到全国各地任职，是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特殊历史现象。它自古少有，历史也恐难再现。

抗日战争之前，山东长期处于新老军阀的残酷统治之下。虽然，党的“一大”12位代表中，两位是由山东党组织派出的年轻人；但是，直到芦沟桥“七七”事变前后，全省共产党员还不足2000名。那时，山东没有党领导的军队，也没有党领导的政权。经过抗日战争，山东解放区拓展到全省面积的80%，党员人数超过10万，党领导的军队达27万人之多；各类干部，仅随军渡海调到东北开辟新区的，就有近1万人。这些党员、部队指战员和各类干部，绝大多数都是20来岁的青年，年龄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有60万青壮年参军，700万青壮年支前。到1949年，山东的党员人数达75万，占全国的1/6。因此，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山东的年轻干部遍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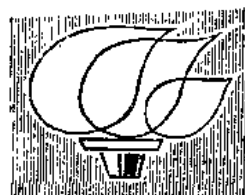
全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代，改变了整个一代山东青年的命运。很多人从课堂上，从机器旁，从穷乡僻壤走出来，奔赴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战场。伟大的斗争改变着国家的命运，也改变着那一代山东青年生活的轨迹。

在“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山东各地学生救亡活动风起云涌，从学校走上了街头。“七七”事变后3个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入山东。热血青年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离别家园，参加武装起义。那时，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动员民众拿起枪来的知识青年，真是成千上万。要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那么，抗战初期，那才真正是团结在一个伟大目标下的全省规模的革命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大浪潮。他们把抗日救亡运动带进了山沟，也在山沟里摸爬滚打，学会了怎样工作。共产党唤醒和培育了他们过人的智慧和才干。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参与创建了广大的山东敌后根据地，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又为大批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在生死考验中，在血与火的洗炼中，他们终于成长为党的领导骨干。

时代造就了他们。于是，一代山东青年勃然崛起。

《火红的年华》这本书的作者们，是那整个一个时代的山东青年中的几位。现在，他们已年过花甲。他们把自己年轻时亲身经历的风风雨雨，写给继往开来的青年读者，为的是过去不应该被忘却，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先烈不应该被忘却。老一代开创了一个新社会，年轻一代继承革命的传统，将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

共青团山东省委研究室编



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

目 录

抗战前夕在济南女师	鲁宝璩 (1)
石友三学兵队	刘 坤 (6)
一个平津流亡学生在山东的成长	杨士法 (11)
我们是新时代的“一百单八将”	王希坚 (17)
在东北军中做兵运工作	李 欣 (24)
朱德青年队长	刘春生 (28)
在三军少先队的日子	于西之 (31)
莒国少年	张明晓 (38)
忆岸堤干校	杨裕进 (42)
年轻的文艺战士	赵 忠 (47)
怀念杨涤生同志	王照华 (53)
敌占区的红孩子队	宋晶亭 (57)
根据地处处有歌声	王宽生 (63)

第一次反“扫荡”在沂蒙	刘导生 (66)
怀念三位烈士	王树森 (71)
花杆钢笔	陈岩生 (75)
起点	牛玉华 (81)
胶东孩子剧团	沈西牧 (87)
忆林江同志	丁 宁 (95)
麻雀战中的青救会	徐万夫 (104)
微山湖畔的枪声	张世珠 (107)
千磨万击还坚劲	吕 放 (111)
到敌人后方去	鲁 钊 (121)
难忘的泽东青年干校	叶联森 (131)
我办《中国青年》杂志山东版	谭西三 (136)
在马牧池村度过的那个春节	张伟强 (139)
陷魔窟而重生	王 克 (143)
我的母校胶东公学	江 波 (151)
劳武结合保卫家乡	杨 川 (158)
妇女识字班	李福玉 (164)
为革命艺术而献身	陈志昂 (166)
从铁蹄下到蓝天上	李向民 (170)
学习写作少年时	苗得雨 (177)
我怎样当了“小先生”	姜田夫 (182)

送夫参军去	公成美 (187)
功勋碑上未留名	王一地 (190)
参加中央讨论建团的会议	杜 前 (195)
125粒子弹消灭110名敌人	魏来国 (203)
青岛山东大学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宋 鲁 (207)
沐河岸边的战斗	侍振玉 (213)
陈毅担架队	鲁 光 (223)
黎明前的觉醒	蒋向红 (228)
《青年文化》始末纪略	江晓天 (234)
抗战诗选	(62) (130) (181) (206)
著名青年烈士	(16) (110) (227)
胶东公学简介	(157)
小统计	(202)

抗战前夕在济南女师

鲁宝琰

省立济南女师早在20年代初就有共产党、共青团的地下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女师学生参加了赴南京的请愿。她们冲破禁令，公演过曹禺写的话剧《雷雨》，轰动一时。1934年夏天我考入女师，编在八年级二班。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来，《义勇军进行曲》等一首首唤起救亡图存激情的歌曲，在同学中广为传唱。女师同学也走出校门，和高中、乡师、济南师范等校学生串连。黑虎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地，曾是我们聚会和接头的地点。1935年12月底，成立了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紧接着相继成立济南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和省学联。我们女师学生救国会是其活跃的一员。

1936年5月，师范的李度、孙鸿文（孙焕章）约我在黑虎泉面谈。他们告诉我，济南高中一位同学刚从北平回来，最近各校代表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是党的外围组织，在济南已开始秘密发展队员。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民先”的事。不久我看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参加了“民先”。女师“民先”主要负责人是郭秋涵（郭彤）。我们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讲演会，发动同学参加市学联和“民先”队部召开的形势报告会，发展“民先”队员。

30年代被国民党宣布为禁刊的14种进步刊物，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钱俊瑞主编的《世界知识》等，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上课时我把它摆在课本下面，趁教师不注意时看上几页。为了躲避训育处的检查，我也在学校的花窖里点上蜡烛看蒋光慈的激动人心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鸭绿江上》等等。同宿舍的6位同学都好看书，响过熄灯铃还点着灯看。有一次，训育员“小方妮”悄悄地来查看。听到她蹑手蹑脚站在窗下，我们“呼”地一下把灯吹灭，端起一盆水往窗外泼去，溅了她一身。我们不仅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组织读书会，推动同学们阅读进步书刊。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新文化先驱鲁迅先生逝世。他对旧社会的无情鞭答，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深刻揭露，象一把硕大的火炬照亮了我的心。他的逝世使进步青年极为悲痛。济南的地下党和“民先”、市学联发起，举行“济南市各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济南师范的李度同学事先和我们联系，“民先”队员们分头到各班串连，全校数十名同学前去参加。会场设在济南师范。记得参加大会的还有知名人士李守章、李广田，《新亚日报》的徐方晨等。大会由师范的刘慕著同学（现名刘汉）主持，一位老师介绍鲁迅先生的不朽业绩。还有几位同学上台演讲。当他们讲到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国土大片沦丧，广大同胞颠沛流离，惨遭日军杀害时，有些同学抽泣失声。散会后，同学们三三两两分散离开会场，但是后来听说还是有几个人被特务盯梢。

1936年11月，傅作义将军率部在绥远抗击日伪军，收复百灵庙。因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人们心情长期压抑、忧伤，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振奋。市学联在师范学校召开抗战形势座谈会，会后民先队员分头到同学中宣传。女师也成立了“绥远抗战将士后援会”，公开组织义卖义演。同学们精心制作小

玩具，织毛袜、手套，绣手帕、枕套，缝制背心。许多同学在熄灯铃后还点上蜡烛，或在路灯下连夜赶制。几天时间就集中了一大批手工艺品，摆在教室里展销。老师、同学以及家长、亲友纷纷前来参观、购买，很快就销售一空。

我们赶排了田汉创作的话剧《回春之曲》。写的是一位华侨青年从南洋回国参加“一二八”抗日战争的故事。他负伤失去了视觉，爱人从南洋赶来看他。在他面前唱起：“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凄婉的歌声打动了全场观众，许多人潸然泪下。我们的合唱队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激昂悲壮的歌声，鼓舞和激励了与会观众。我们把义卖义演所得的钱和实物，交给济南市各界援绥抗战慰问团，托他们带到了绥远前线。

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消息传来，济南学生的情绪简直是沸腾了，都希望杀了蒋介石，以泄民愤。后来，把蒋介石放了，大家都不理解。国民党当局为蒋介石回到南京，要各校学生参加庆祝游行，女师的同学加以抵制，未去参加。

“会考”是国民党禁锢学生救亡活动的一个手段，用考试迫使学生埋头功课，无暇过问国事。我们八年级是1937年的应届毕业生，所受的精神压力很大。为了挣脱这个枷锁，市学联发起抵制会考，推选代表到省教育厅交涉。代表有高中的赵修德、孙玺琪，女师的郭秋涵和我，还有几位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教育厅长何思源是国民党嫡系，不等我们说完就大弹“读书就是救国”的老调。我们又去找韩复榘，他在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的陪同下接见了我们。他态度装得十分和蔼，对我们表示同情，但推说教育方面的事还是教育厅长负责，是否会考由何思源决定。这次请愿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使广大同学进

一步认识了国民党政客阴险狡猾的反动面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1937年5月，组织“东北大学学生护校赴京请愿团”，反对国民党停办东北大学，反对分化瓦解东北军，争取流亡的东北学生有书读，流亡的东北军早日开赴抗日战场。请愿团的列车路过济南时，市学联串连各校派代表去车站看望和慰问。我是代表之一。回校后，冒着被开除学籍或被捕的危险，代表们分头到各班讲演，发动募捐，支援东北同学。女师在一两个小时内就收到大量捐款，行动之快，钱数之多，出乎意外。当晚，我和郭秋涵、丁祥雯等6名代表，带着捐款重返车站。各校前来声援和慰问的同学挤满了车站广场，黑压压一大片，大约有千人以上。同学们齐声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一遍遍地唱：“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地方是我们的！”大家流着激动的眼泪，歌声如泣如诉，有的女同学抱在一起，哭作一团。广场周围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目睹此情此景，也深受感动。

车站上没有发生意外，女师校园里却出了大事。

我们的代表去车站送捐款离校后，校内同学情绪激动，要求到车站去声援东大同学，校方不允。在狂怒之下，同学们打了训育主任，手挽手往外冲，校门的锁砸不开，就找校长；校长不在校内，盛怒的同学又砸开了她的宿舍门。平时，校长常宣传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见到学生穿短裙、凉鞋、短袖衣裳就严厉训斥。现在从她的房间里找出了粉盒、胭脂、半高跟凉鞋，还有一尊爱神维纳斯的铜像。同学们可解恨了，都给她拿到外面来展览。训育主任从厕所墙上跳出去，打电话叫来军警，把学校包围了起来，扬言要逮捕肇事者。年迈的事务主任大笑说：“女学生闹学潮，真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

当我们6名代表夜半返校时，远远看到学校周围有军警走

动，知道校内出了什么事，立即转身往回走。一队军警发现了，跑着追了过来。我们穿进小胡同飞奔，进了住在新街的知名进步人士张金铎先生家。张老太太热情地接待我们，烧了汤面给我们吃。张家后院住着齐鲁大学教授吴振寰和女师体育教师初若滔夫妇。他们听说后过来询问，让我们放心住下，待事情平复后再说。但我们情绪激动，毫无睡意，竟和张老太太畅谈通宵。

次日，初老师从学校带回消息说，学校罢了课，校方决定开除6位代表和在校内的陈秀、袁耀华同学。开除的牌子（布告）已由校长签署，但遭到了大多数老师的反对。他们认为学生爱国无罪，开除的又是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此老师们酝酿以罢教来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又过了几天，初老师笑嘻嘻地回来对我讲：校长已收回成命，并表示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学校已准备复课，你们可以返校了。我们在张老太太家住了将近一周，受到她老人家和吴、初夫妇的热情款待，同她们交上了知心朋友。我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女师。

七七事变后，回到故乡泰安，我参加了抗敌后援会和抗战剧团。泰安沦陷前屡遭敌机轰炸，我随父母到铁路西丁家洪沟亲戚家避难。听到徂徕山起义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1939年春节，日本宪兵把我的两位伯父抓去，严刑拷打，要他们交出早已离家参加革命的我的两位哥哥——宝琰和宝琪，把老人折腾得死去活来。这件事更激起了我满腔的悲愤，实在忍无可忍。我和珩弟多次商量，要离家出走，参加抗日，报仇雪恨。这年中秋节前夕，家里人忙着过节，我把事先写好的告别信压在油灯底下，和珩弟悄悄溜出了大门，换了衣裳，把辫子梳成发髻，离开了家。由于地下党的帮助，在徂徕山上找到八路军驻泰办事处，从此投身于抗日的行列。

石友三学兵队

刘 坤

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乡师，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根本转折。我是在封建家庭的万般阻挠下，在繁重的家务劳动间隙，经过几年的自学，才识了字，识了数。又经过投井自尽这样的殊死斗争，才赢得了上学的机会。考上乡师只相当于初中一年级，而我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

正因为我是在多灾多难的鲁西南长大的，从小踩着凳子帮母亲刷锅洗碗，纺线织布直到夜深，所以我格外同情工农的苦难，格外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而乡师是个进步学校，同学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以入学不久我就参加了读书会。通过进步同学的帮助和自己读书看报，思想上从追求个人解放到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安危，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1936年春，参加了学联、妇联（抗日救国联合会）和“民先”，参加了学生自己组织的军事训练，以及演剧、办墙报活动。为了到女师、齐鲁大学和成通纱厂去宣传抗日，我摔了不知多少跤，学会了骑自行车。寒假不回家，到工厂了解女工的痛苦生活，向她们宣传抗日，组织“姐妹会”。

1937年5月，我加入了共产党。上学的日子里，我在大明湖南、鹊华桥西租了一间小房住，暑假也不回家。七七事变爆发后，济南成了军队上前线、伤员运后方和平津学生流亡的必经

之地。我忙着参加慰问军队、接待平津同学，还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战地救护训练班，一方面学习战伤包扎，一方面联系医务界的爱国青年。

一天夜间，我们到火车站慰问上前线的军队。同学们站在闷罐车前，热情地唱歌，激动地演讲，凄婉地述说难民的流亡之苦。在列车开动之前，同学们向开赴前线的将士们倾诉自己的一腔激情，把中国和民族的生存希望寄托在将士的身上。忽然传来急促的集合哨声，我们100多位同学被国民党军警带出车站，带进了二大马路的“军法处”。军法处长魏汉章咆哮着训斥我们：“谁叫你们去慰劳的？抗战是政府的事，你们好好念书就是救国！”训话中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勤务兵给魏汉章打着伞，而我们却被淋得浑身湿透。在那个黑暗社会，竟然是爱国有罪！

9月初，乡师校方贴出告示：战事迫近济南，学校准备南迁，女生一律退学。这样一来，我不仅不能继续上学，而且断了生活来源（乡师学生每月发津贴）。怎么办？听说和我一个党小组的李树屏参加了石友三一八一师学兵队，我就跑到县东巷巷子后街五号一八一师招兵处去找他。他说：石友三当汉奸是过去的事，现在他参加抗战，我们就团结他。这是一支旧军队，我们参加进去可以改造他嘛！学兵队里，大都是东北和平津的流亡学生，还有几位大学教授，有党的组织，有女同学。李树屏劝我也报名参加，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在招兵处登上记，我当即脱下旗袍换上了军装。当我回到乡师收拾行李时，同学们围上来问长问短。第二天，乡师又有30多位同学去报了名。学兵队有了100多人，绝大部分是思想进步、决心抗日的同学，其中女生12人，有几位是济南女子职业学校的同学。

1937年9月25日晚上，学兵队登上火车离开了济南，向北进